

第一届中国翻译史研究暑期班综述

◎ 张莹

2009年6月20-25日，香港中文大学在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翻译学研究中心举办了“阅读翻译史研究暑期班”。参加者包括来自中国大陆、香港、台湾和新加坡等从事翻译史研究的博士生和教师30多人。研讨班共邀请了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王宏志教授、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胡志德教授、复旦大学历史系邹振环教授，台湾中国近代史研究所黄克武教授五位近现代翻译史研究领域的知名学者主讲。

从“新名词之战”的角度展示清末严复等人为对抗“和制汉语”（即日译新名词）所作的种种翻译技术性及机构性的努力。研讨班期间，主讲教授们用下午的时间回答学员们的提问，和学员们讨论翻译史研究的方法与心得。主要观点如下：

一、翻译理论在翻译史研究中的正确角色和位置

“翻译史研究是否需要翻译理论及如何在翻译史研究中应用翻译理论”是此次研讨班讨论最热烈的话题之一。针对这些困惑，王宏志从霍姆斯的学科地图入手，指出正是描述性翻译理论的提出为翻译史开辟了广阔的空间。历史事件其实每天都在发生，只有理论意识才可以培养“史识”，培养发现问题的功能，学者的功能和意义才显示出来。缺乏理论视角的指导，翻译史研究就容易停留在史料的搜集、考据和罗列上，无法更深刻展示翻译活动与历史进程之间的内在联系。其他几位学者也强调，正是翻译研究从语言史观转向文化史观，才令翻译史这个领域日渐繁荣。

不过，虽然翻译史研究不能缺少翻译理论的指导，这并不意味着具体的某个翻译理论论证或理论提升。用翻译史验证某个翻译理论的适用性只在理论提出初期具有较大意义。当某个翻译理

论已经被广泛认可后，学者们就不应停留在理论与史实之间的简单连线，而应尽力将理论理解后内化在自己的翻译史研究中。例如，王宏志的论文《马戈尔尼使华的翻译问题》描述了1792年英国使节马戈尔尼（George Lord Macartney）访华过程中译者的个人背景、语言水平、所处立场等，全文没有出现任何翻译理论的引用，但读者可以感受到与描述性翻译研究相契合的很多视角。

二、翻译史研究在翻译学与历史学两个学科中的正确定位

“翻译史研究属于翻译学研究还是历史学研究”是另一个常被学者们提出的疑惑。邹振环借用托马斯·库恩的科学内部史和外部史分类，提出翻译研究的内部史和外部史概念。文化转向之前的翻译史关注的是不同译作与原文本之内的语言转换关系，是翻译学的内部史，不是历史学感兴趣的领域；而20世纪末的中国翻译史研究开始关注历史上对语社会产生重大影响的翻译活动，藉此反映一个时代的面貌和文化碰撞的复杂过程，是翻译学的外部史，同时也是历史学“西学东渐”研究的兴趣所在。这类翻译史研究同时属于翻译学和历史学。翻译学长于文本对比，历史学长于文献考据，两个学科的方法论在翻译史领域可以形成有效的互补。

三、翻译史研究者需要修炼的几项基本功

“怎样才能做到拓展史料并有效地进行翻译史研究”是学员们最关心的问题。针对同学们的提问，各位教授就翻译史研究方法论问题希望同学们加强以下几项学术基本功：

1. 随时掌握学术行情，训练敏锐的选题目光
诸位学者都十分强调了解“学术行情”（包括研究方法和学术热点）的重要性。只有熟悉翻译理论、翻译史领域的整体研究状况和最新动向，培养出敏锐的学术触觉，才有机会在广泛的阅读中找到有深挖价值的学术线索。例如，黄克武就曾从广泛的阅读中发现20世纪20年代上海《申报》刊登的英国药品广告过于具有所谓的中国特色，由此敏锐地发现其中可能存在翻译问题。经过与同时期该药品在英国、美国、澳大利亚等国报纸上的英文广告对比，黄克武（1998）发现《申报》上的广告翻译凸显了20世纪初上海的医疗文化与生活观念。又如，邹振环在清末民初的大量文献中发现很多关于当时译本的读后感，他及时做好札记，在进一步挖掘下完成了对中国翻译史研究有很大贡献的《影响中国近代社会的一百种译作》。这种自下而上的、从阅读中发现问题的研究路向才是推动学科发展的正确路向。

在翻译史“学术行情”的大方向方面，邹振环提出中国翻译史仍存在许多尚未充分挖掘的堆积层：如佛教在中国文化扎根的漫长历程中经历了与本土道、儒学东渐”研究的兴趣所在。这类翻译史研究同时属于翻译学和历史学。翻译学长于文本对比，历史学长于文献考据，两个学科的方法论在翻译史领域可以形成有效的互补。

有一些中方译者没有署名，译者在合作的过程中如何博弈和操纵的是又一个堆积层；晚清以来中国的发展受到外部文化的强烈影响，更是蕴藏丰富翻译史料的宝藏，至今很多翻译活动和翻译出版活动都有待研究。例如，欧洲耶稣会自1846年在上海建立土山湾印图书馆到1950年翻译发行了大量宗教及文学作品，其翻译赞身与其翻译活动的影响都会给翻译研究带来启迪。

2. 围绕翻译史实广泛阅读各学科成果，训练立体还原历史语境的能力
学者们强调的另一点是翻译史研究不能只阅读本学科已有的研究成果，否则很容易陷入人云亦云和炒冷饭的困境。王宏志以研究鸦片战争中的官方翻译活动为例，建议研究者阅读历史学、政治学等相关学科的研究资料，了解中英当时的政治关系、商业贸易和传教士在当时的活动、中英朝廷和英国政府的事务规范和情报渠道等。邹振环举例说，如果研究同文馆，一定要研究中国教育史。对历史上某个翻译活动如何发生、产生什么影响了解得越多，就越容易抛开一些想当然的错误假设，更多地思考翻译活动背后的本质性联系。

3. 敢于质疑和假设，训练独立思考和创见的能力
在研讨中，几位学者都提到立思和创见的能力。严谨治学和避免学术浮躁的问题。历史是复杂的，研究者不能为了所谓结论而随意将历史简单化，对于他人的结论，研究者也不该草率照搬。例如，邹振环提到晚清时期很多传教士的译作都只写一个译者，但事实上多数译作都不是独立完成的，必须考虑到可

能的匿名译者。研究者在作史实判断的时候应尽量避免转引，尽可能多地找到历史佐证，让严谨成为一种习惯。

同时，学者们鼓励同学们在较为严谨的史实支撑与合理的逻辑下勇于提出自己的质疑、假设。王宏志以自己对鲁迅的研究为例，针对“域外小说集”销量很低的原因之一是短篇小说在当时还不被接受”这个论断提出质疑，通过大量的史实考证，修订这个值得商榷的结论。邹振环则将自己博士论文《晚清西方地理学在中国》作为大胆假设的案例，讲解如何通过合理设定“晚清西方地理学”影响程度的几个指标，较有说服力地说明了西方地理学在晚清的形成和巨大影响。

自霍姆斯、图里等学者提出描述性翻译研究方法以来，翻译学研究方法打通了一条重要经脉，显示出蓬勃的活力。历史上诸多被忽视却耐人寻味的翻译活动走进翻译研究者的视野，使翻译史研究成为翻译学中最富生产力的研究领域。中国历史形态极为丰富，其对外交流史曲折多变、错综复杂，是翻译史研究可以采掘的丰富宝藏。这次中国翻译史研究暑期班用资深学者们高屋建瓴的学术眼光和春风化雨的学术教育，为从事翻译史研究的青年学者们指明了研究方向。随着更多的学者以正确的研究方法加入到中国翻译史研究的队伍中来，中国翻译史将成为中国译学研究中成果最为丰硕的一个分支。□

◎ 张莹
上海外国语大学高级翻译学院讲师
swgjzhangying@yahoo.com.cn